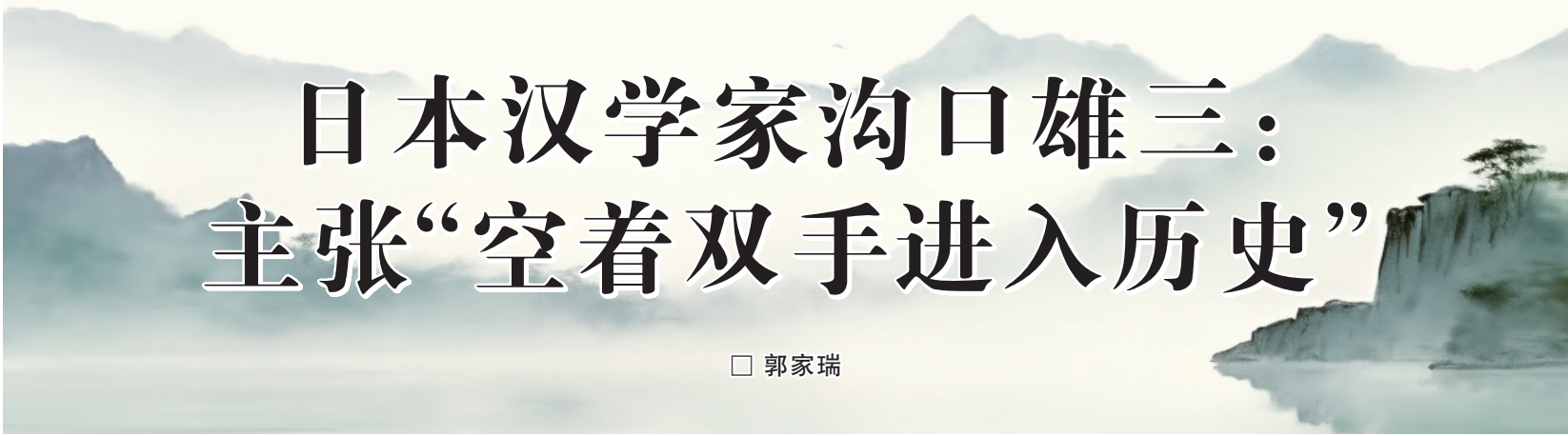




# 日本汉学家沟口雄三：主张“空着双手进入历史”

□ 郭家瑞

沟口雄三（1932—2010年）是日本当代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中最具代表性、与思想性的大家之一。他出生于日本名古屋市，先后就读于东京大学与名古屋大学。沟口雄三一向治学用功，有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对于中国明清思想史以及近现代思想史均有独到创见。作为战后成长起来的学者，他并非安居一方书斋之人，同时也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极力主张“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认识论，以毕生之沉潜勾勒出中国近代的历史脉络，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特的世界史视野，提出了多元文明的世界图景，其研究对于日本乃至世界中国学研究领域都具有先驱性的重要意义。

## （一）

少年时的沟口雄三对于西洋文化有着狂热追求，曾形容自己“所有的细胞都散发出资欧文化的气味”。然而在大学期间，他却放弃德文转修中文，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沟口雄三在晚年忆及这一生人转向时说道：“中国革命使我获得了一个自觉，就是涤荡了我的幼年时代、少年时代，以及我遭遇到毛泽东革命时的全部历史。”沟口雄三在大学时了解到了日本侵华历史与中国革命情况。他猛然意识到，自己接受的历史教育是经过涂抹与修改的谎言，也觉察到内心深处对于亚洲的歧视和偏见。这一涤荡使得他的内心发生了颠覆性变化，促使他转向对中国的研究。

之后，他花费了毕生精力沉潜于中国前近代的哲学思想与历史研究，提出了“基体展开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等富有创见和影响力的观点。此外，沟口雄三还积极参与到学会活动与社会活动中去。他在东京大学任教期间，创设了“东大中国学会”（后更名为“中国社会文化学会”），其最大特点是打破学科壁垒，不仅关注中国哲学与文学，也关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这在日本是很少有的。沟口雄三在东京大学内部建立了文史哲跨学科对话机制，强调思想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与联动。经过数年耕耘，使得东京大学人文部以其综合性特色成为日本汉学研究的一方重镇。沟口雄三还于2007年

作为牵头人联合全日本宋明学专家之力启动了《朱子语类》日译及出版这一浩大的学术工程。他为了筹措资金多方奔走，并为出资企业家的研习机构义务开设《论语》讲座。沟口雄三所主导的这些学术工作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中国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沟口雄三认为中国古代典籍的研究并不止于勤勉地积累知识，然后将这些知识进行精密的罗列组合，而是应该将其视为认识一个国家民族的存在方式来认真对待，并将这一学术研究与当下时代联系起来。怀着这样严肃的追求，沟口雄三在其研究生涯中不断自我追问：在这个亚洲不断剧变的时代，我身为日本人为何要研究中国学？我做中国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又是什么？在中国哲学思想的世界沉潜近50年后，他心中的答案逐渐明晰：以他者视角重新思考中国历史运动及其变革的内在逻辑，将亚洲民族国家置于亚洲自己的历史脉络中去理解，进而以中国为方法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固有范式，从人类普遍性立场出发重新理解现代世界的多元性。

沟口雄三的这种自我追问，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学术取向，也促使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组织了超越国家和民族的“中日知识共同体对话”活动。参加对话活动的中日两国知识分子，以强烈的责任感和追求正义的共同立场，对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及当下世界的具体问题均有着深切关怀。对话持续了6年之久，致力于自我批判和对固有偏见的消除，为促进中日之间沟通交流及增进世界各方学者的互相理解起到积极的作用。

## （二）

作为重视方法论的学者，沟口雄三提出了自己的历史认识论，构建了当时颇具冲击力的研究范式，开启了日本中国学研究之新风气。

在沟口雄三对中国学研究的思考中，回到真实的历史本身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沟口雄三认为：“虽然人们总是说历史学是有关事实的学问，但是我觉得历史学是有关事实的选择方法和组合方法的学问。”因此，在历史叙述这一工作中，历史学家的意图成为根本问题之一，即

历史学家从什么立场出发来选择事实并进行组合，期待借此传达什么声音。对此，沟口雄三的主张是“空着双手进入历史”。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必须放弃既有的意识形态、知识框架以及内在偏见。此外，研究者需要在不限定研究主题与对象的前提下，以时代先后为顺序，阅读尽可能多的文献。这样才能排除寻找事实、取舍组合的可能，进而寻找到历史的本来样态。

此外，“空着双手进入历史”的同时必定有一个进入历史的自我存在。沟口雄三强调，这一自我存在的意图，必须不同于意识形态与既定偏见之类的意图，而应属于更高层次的“被给定的意图”。他以自身经验为例，指出自己的研究意图为：与当今世界的偏见与歧视战斗，对抗亚洲研究领域中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为框架的偏见与偏见的再生产。这一意图也是他追寻中国历史脉络的动力所在。值得注意的是，沟口雄三专门指出，自我存在的意图虽然是推动历史研究的原动力，但并不直接构成研究者进行历史叙述的先行前提。因此，研究者们必须一直保持对自己意图的不断追问。

沟口雄三认为，只有经由不带任何先在观念地对史料的沉潜，某种历史脉络和历史动力才有可能自行浮现。沟口雄三在提出这一历史认识论的同时，也将其诉诸学术实践。他沉潜于明清思想史中，将哲学性的思想史与经验性的社会史融合起来，勾勒出了从宋代二程学、朱子学到明清思想家群的动态历史脉络，由此提出了著名的“基体展开论”，即中国近代是以中国固有传统为基体发展而成的，主张抛开欧洲标准与进化史观等预设的历史观念，而从中国内部出发进行研究阐释。沟口雄三的历史观重构，为理解中国近现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论述框架。

## （三）

沟口雄三在深入宋明理学思想世界之后，发现中国思想自有其发展的内在逻辑与脉络，无法以欧洲的历史叙述与价值观念为基准来评判分析。这一发现促使他以相对于欧洲的“亚洲”为空间单位，构筑

出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历史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更为宏大的气象，形成了多元性世界文明图景。

在沟口雄三所在的时期，主流学界的世界认识建立在以欧洲标准为世界标准的基础之上。但沟口雄三在长期的学术探索中，通过中国的哲学文本与历史文献看到了一个以欧洲标准无法把握与衡量的世界。他的著作《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中国的冲击》以及《作为方法的中国》等，均在在当时主流的知识模式发起挑战，试图构建独立于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的学术范式。在他的论述中，中国的内在历史逻辑有着自己的独特性，并非遵照或对立西方标准的存在。在中国的哲学概念或历史脉络中，有的与西方价值相关或相对。但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处于互不相交的状态，各自发展不同的历史叙事。可惜的是，学界常常因为欧洲标准，忽视或拒绝去关切中国历史的独特性。

值得注意的是，沟口雄三对欧洲标准的拒绝，并非为了独尊亚洲标准。他试图通过建立多元化历史观来充实人们对于世界的多元性认识，构筑多元的世界图景。在认识中国特殊性的同时，欧洲标准便得以相对化。这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以往视欧洲中心主义为普遍标准的思维框架，找到更为包容、准确的评价标准。但除了认识中国，还需要“把视野扩大到中国之外，展开一种超越哲学、思想和思想史框架的新研究”，去追寻比之更高的目的。

沟口雄三指出：“以中国为方法的世界，就是把中国作为构成要素之一，把欧洲也作为构成要素之一的多元的世界。”在这一构想下，欧洲和亚洲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各有其特殊性，两者都应被放在世界的背景下来进行理解。因此，不同国别的学者们应当站在文化的立场与人类普遍性的立场上，通过平等地理解世界不同部分的历史脉络，来探索更高层次的世界秩序，创造和谐包容的多元世界图景。



（上接1版）  
理清监督思路，推进政治监督以具体求深入。政治监督不是空泛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实践的，不能避实就虚、浮在面上，必须做到具体明确、心中有数。监督任务要具体。督促推动党员干部把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政治要求来践行，作为最严政治纪律来遵守，以正确的认识和行动，坚决、全面、无条件地执行，确保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监督内容要具体。围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聚焦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大战略、重大任务、重大举措以及党中央因时因势作出的决策部署，有针对性地加强监督检查，督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切实承担起自身职能责任，紧密联系实际把党中央大政方针一项一项落到实处。监督评价要具体。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针对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提出的“三个看”的重大要求，从政治、思想、纪律、作风等多个层面进行全面评价，用细化实化具体化的标准作出明确判断。

突出靶向施治，推进政治监督以精准求实效。开展政治监督，重在精准，也难在精准，必须坚决防止监督泛化、靶向偏离。聚焦重点岗位、重点领域、重要工作、重要环节，盯住重点人重点事，及时发现并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切实打通贯彻执行中的堵点淤点难点。精准发现问题。坚持问题导向，把贯彻落实中存在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不顾大局、搞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照抄照搬、上下一般粗等突出问题找出来，把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搞清楚，成为发现问题的“尖兵”。精准分析问题。从主观、客观、思想、态度、动机、行为等多方面综合分析，研究判断具体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政治站位问题还是能力水平问题，是纪律作风问题还是体制机制问题，是少数干部的个性问题还是整个单位的共性问题，为靶向施治提供依据。精准解决问题。坚持发现问题和推动解决问题并重，既综合运用监督执纪问责、监督调查处置等措施，坚决有效纠正各类政治问题和偏差，又着眼深化标本兼治，提出可操作、可落地、可整改的高质量纪检监察建议，进一步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推动深化改革、完善制度、规范用权、优化治理。

坚持抓在日常，推进政治监督以常态求长效。政治监督与其他工作不是割裂开来、分分设设的，必须融入过程、管在日常、抓在经常。做好全过程监督。把政治监督贯穿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融入重大发展战略、重要政策举措、重点项目任务的制定和落实之中，推动完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机制，驰而不息促进各项政策落实落地。做好全要素监督。把监督人与监督事有机结合，从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履职尽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用实打实的工作成效评价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尽责情况；把监督过程与监督结果有机结合，

既动态跟进、密切关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进程，更注重最终落实的成效和质量。做好全周期监督。树立全周期管理理念，对政治监督重要事项实行清单化、台账式管理，盯紧盯牢专题学习、安排部署、起草方案、具体执行、结果评价、建章立制等各个环节，形成完整监督闭环。

## 全方位构建抓落实工作体系，为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提供有力保障

政治监督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狠抓落实，攥指成拳、形成合力，推动政治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在加强党的领导上下功夫。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定扛起监督专责，充分发挥协助引导推动作用，督促各级党委（党组）履行主体责任，统筹推进各类监督主体有序衔接、贯通协同，形成各负其责、一体推进的工作格局，增强政治监督整体效能。

在创新方式方法上做文章。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大胆探索、勇于创新，打好集中性全覆盖、专题性、机动式、点穴式、提级式和整改“回头看”的政治监督专项检查“组合拳”。同时，更加注重把政治监督融入改革发展、融入专项治理、融入审查调查，推动监督常在、形成常态。

在健全制度机制上出实招。着力健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监督、报告、通报制度，完善台账管理、监督问责、整改纠偏、“回头看”等制度，确保执行不偏向、不变通、不走样。完善政治监督协同配合机制，对内建立内部协调沟通制度，加强监督检查与审查调查、巡视巡察机构面对面沟通，交流政治监督“活情况”；对外与宣传、网信等部门建立重要敏感政治信息通报制度，及时发现党员干部违纪违法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言行，强化处置重大群体性事件、危害国家政治安全事件的协调配合。

在提升能力素养上见实效。把政治监督作为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的必修课，举办政治监督专题研讨班，进一步明确政治监督的方向、重点和方法。坚持鲜明政治导向，鼓励纪检监察干部在丰富的斗争实践和严格的政治生活中，增强斗争精神，提高斗争能力，敢于坚持政治原则，锤炼精准识别政治问题、纠正政治偏差的真功夫。树立对历史和干部高度负责的精神，精准把握运用政策策略，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实事求是运用“四种形态”，在监督中体现支持、在监督中强化保障，建立容错纠错、澄清保护、回访教育协同机制，做到纪法情理贯通融合，努力实现政治、纪法、社会“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山西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

# 明代《广舆图》：改变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的认知

□ 刘翔运 施 诚

《广舆图》是明代学者罗洪先制作而成，大约绘制于嘉靖二十年（1541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图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分省地图集。制作出版后广为流传，不仅明清时期的诸多文人士大夫以其为底本绘图，西方制图学家也借鉴其来绘制中国地图，这些地图传播到欧洲后，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地理面貌的认知，中国地理的准确面貌也逐渐呈现在欧洲绘制地图之上。德国学者柯恒儒称赞《广舆图》为“我所知道的在托勒密之后的最佳地理著作之一”。

## （一）

罗洪先为江西吉水人，中国明代理学家、地理学家、地图学家。在各地搜访旧图的过程中，他发现旧图谬误颇多，不能满足舆图对地理实际的准确性反映。寻访3年，偶然间得到元代朱思本绘制的《舆地图》，绘制得较为准确，但是“长广七尺，不便卷舒”。于是，罗洪先历经十年，参鉴、校订众多地图资料，将《舆地图》分幅转绘，添加大量的文字说明，绘成包括有45幅地图、68幅附图共计113幅地图的《广舆图》。《广舆图》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综合性地图集，采用总分式的编绘

结构，既包含大明疆域总图、分省政区图、周边地图及邻国地图此类普通地图，还有边境图、漕河图等专题地图，且图后都附有文字说明和图表，详细描述政区沿革、山川地理以及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内容，且收录有一些名臣对于处理朝政的议论，表现出罗洪先心系天下、经世致用的制图理念。

《广舆图》中的《舆地总图》、分省图主要是根据《舆地图》改绘而成，但九边图、漕河图等都是参鉴大量地图资料补充编绘的，同时对于旧图中内容、位置谬误之处加以订正。罗洪先在绘制《广舆图》时参考《声教广被图》《九边图论》《大明一统图志》等当时尚存的元明地图，因此保留了元代以来一些失传的珍贵古地图资料。

《广舆图》沿用了《舆地图》的“计里画方”之法，绘图时在图上画满均等大小的方格，方格的长度代表着实际里数，然后按照实际距离将地理内容绘制到方格内，从而具有一定的准确性。

罗洪先提出“省文”的概念，在《广舆图》中初步形成了标准化、系统化的地图符号系统。他认为“山川城邑，名状交错，书不尽言，易以省文二十四”，于是对州、府、县、卫、

所等地物标志分别用二十四种图例符号表示，代替了旧图常见的以文字说明标记的方式。早在秦汉时期，我国就已有用符号代表各类地理要素的方法，但《广舆图》的符号系统具有整体性、联系性的表达结构，是中国地图符号绘制近代化的重要体现。

## （二）

《广舆图》制作出版后，成为当时地图绘制的范本，诸多制图学者纷纷以其为底本绘图，形成了《广舆图》制图体系。

明清时期，涌现出许多对《广舆图》的仿制地图，最具代表的如汪作舟《广舆考》，全图除增加部分考证、论述的文字外，舆图的形式、编序与《广舆图》基本相同。明朝末年吴学俨、朱绍本等人编制的《地图综要》，明显可以看出是基于《广舆图》万历钱岱刻本改绘而成。此外，陈组绾《皇明职方地图》，潘光祖《汇编舆备考全书》，沈定之、吴国辅《今古舆地图》以及陆应阳辑、蔡方炳辑补的《增订广舆记》等都是利用《广舆图》为底本改绘而成。据统计，或是基于《广舆图》进行改编，或是以《广舆

图》中的某些地图进行抄录或改绘的著作至少有40多种。清朝初年，顾祖禹所撰写的著名军事地理历史著作《读史方舆记要》，其中附录的《舆图要览》基本是沿袭《广舆图》的编图内容、形式，书中关于分省舆图附录的文字大部分也是来自《广舆图》，顾氏仅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关于各省地理位置的分析和评价。

早在西晋时期裴秀就提出按“分率”（即比例）绘图，这是“计里画方”法的起源，但是元代以前流传下来的舆图中，采用“计里画方”法绘制的地图极为罕见，大部分都是没有确定比例尺、非定量的描述式地图，直到《广舆图》的绘制才将其普及传播开来。《广舆图》中的大明疆域总图和分省分图都使用了“计里画方”法绘制，总图“每方五百里”，各省图“每方百里”，其余的专题地图采用每方或百里或二百里不等的比例绘制而成，保证了《广舆图》的准确性，也使“计里画方”法得以传播开来。因此，当时已经较少使用的“计里画方”制图方法又在明清舆图中大量使用，直到清朝光绪年间编纂《会典舆图》时，其中虽然采用现代制图法和经纬度数据进行绘图，但仍广泛运用

“计里画方”法。《广舆图》制成后的200多年间，前后翻刻次数达7次之多，影响明清制图长达300年之久。

## （三）

在《广舆图》传入欧洲之前，T-O地图（一种欧洲中世纪世界地图）占据着欧洲制图学的主流，所有陆地被分为欧、亚、非三大洲，亚洲地区位于地图的顶部，中国通常位于尼罗河边的角落，此时对于中国地区的描绘更多是依据想象。虽然13世纪《马可·波罗游记》的问世，为欧洲认知中国提供了重要资料来源，但中国及其周边的地理情况对他们而言仍然是未知数，1375年出版的《加泰罗尼亚地图集》，被誉为“中世纪地图的巅峰之作”，但其将中国的海岸线轮廓描绘成半圆形，这显然是基于欧洲中世纪圆形世界地图的想象绘制而成的。

1625年，英国地理学家珀切斯在伦敦出版《珀切斯的朝圣之旅》，其中收录的两幅地图展示了《广舆图》带来的关于中国地理的认知冲击。《珀切斯的朝圣之旅》首先展示出1584年版奥特里乌斯绘制的《寰宇大观》，将明朝两京十三省绘制成酷似竖琴的三角

形，这是当时欧洲大陆广泛传播的中国地图的经典模样，无疑与真实的中国地理状况相距甚远。但是在此图的40页后，书中刊出一幅基于《广舆图》绘制的《皇明一统方舆备览》，此图才展示出明帝国疆域的真实形状。其实，珀切斯刊登这两幅地图，就是为了将它们作对比显示出“过去所有欧洲绘图师在描绘中国时都犯下了谬误”。

17世纪，欧洲大陆广为流传的《中国新地图集》，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的认知。《中国新地图集》基于《广舆图》改绘而成，在1655年于阿姆斯特丹以拉丁文本出版，风靡一时，该年还出版有德文本，次年荷兰文、法文出版，1658年西班牙文本出版，在欧洲大陆迅速建立起广泛的传播网络，成为当时欧洲了解中国地理状况的必备读物，它也被誉为“地理学上的里程碑”。此外，在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至今都藏有《广舆图》不同的刻本和抄本。

《广舆图》作为当时中国地图绘制的范本，成为众多欧洲制图学家绘制中国地图的经典底本，随着《广舆图》被改绘传播，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精度得到极大提升，地理形状更符合实际情况，地名标记也更为准确，尤其是以往依据幻想绘制出来的模糊海岸线逐渐接近实际，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对中国地理认知的认知。17、18世纪，欧洲正值“中国热”发展走向高潮的时候，《广舆图》作为当时众多中西学者绘制中国地图的经典样本，承载着地图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架起了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